

保持恒久斗争精神的古代循吏

□ 石志刚



古代循吏能做事、敢做事、善做事。其中，善做事是考验循吏的试金石。能否秉持一抓到底、长期斗争的理念去从政为民，关系到善做事的成效。《颜氏家训》中说：“多为少善，不如执一。”持之以恒地与各种问题斗争，善于在长期斗争中解决问题，做到善始善终，最终受益的是百姓。

张养浩

元代名臣张养浩在读书、做官等方面都能做到持之以恒。他年少好学，“年方十岁，读书不辍”“夜则闭户，张灯窃读”。他走上仕途后，担任堂邑县尹期间，针对乱设祠庙问题，扭住该问题不放，着力拆毁30多所祠庙。他为官敢言，经历了宦海沉浮后仍不改本色，殊为难得。元英宗即位后，让张养浩参与核心事务决策。恰逢元宵节将近，元英宗想悬挂彩灯以过节，这时，不改直言本色的张养浩的奏疏到了元英宗手中，奏疏中告诫皇帝“尤当戒慎”“以喜奢乐近为戒”。元英宗先怒后喜，大加赏赐了张养浩，“以旌其直”。如果没有盯住问题不放的决心和勇气，是不会有此行为的。

关中大旱，民不聊生，朝廷派他做陕西行台中丞。深知赈灾任务沉重的张养浩带着救灾的粮食和其他物品，登车赴任，赶往灾区。沿途中，“遇饿者则赈之，死者则葬之”，详细了解受灾情况、发放救灾物资、及时慰问灾民，有序推进救灾工作。当时，因遭旱灾，粮食短缺，米价昂贵，部分米商勾结官府中人哄抬物价，百姓民不聊生。张养浩想实招、出实策、打重拳，平息了这场风波。“到官四月，未尝家居，止宿公署”

“终日无少怠”。当地百姓在他的治理下生活得到改善，但是他却“得疾不起”“卒年六十”。“关中之人，哀之如失父母”。

伊桑阿

康熙时期名臣伊桑阿在1655年中进士后走上仕途，在其从政近50年的时间中，做事认真，实心勤恳，被康熙评为“勤劳岁久”。伊桑阿之所以能够有“勤劳岁久”的美誉，得益于其对待不同工作总是能够以一抓到底的精神去把握和落实，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因他在工作能够做到“凡事推诚，从公料理”，被康熙推为心腹大臣、贤良宰辅。

1677年，清军与吴三桂军在湖南对峙，清军因缺粮只而久攻不下。康熙于是派遣得力干将伊桑阿修乌船、沙船，以满足前线作战人员的军事需求。伊桑阿亲自带领造船官员前往江南地区“速行督造”乌船60艘、沙船200艘。由于伊桑阿直接负责，确保造船任务在次年得以顺利完成，如数运往湖南前线，保障了战场的军事需要。

1679年，“俄罗斯犯边”，沙俄侵略我国东北边疆日益加剧。随着东北军事形势的严重，通过备战打仗维护我国合法权益成为当务之急。而修造军事武器成为当时北御沙俄的重中之重。伊桑阿“奉命往宁古塔督修战舰”，立即出关北上，不顾东北天寒地冻，与当地官员一起赶造战船，为之后反击沙俄做好了军事武器上的充足保证。

1688年，额鲁特蒙古准噶尔汗噶尔丹在沙俄唆使下借故攻打喀尔喀蒙古，北部边疆危机激化。康熙为了解决北部边疆危机，决定亲率大军，征讨噶尔丹。在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过程中，伊桑阿随驾亲征。虽然当时伊桑阿已经年过花甲，但他仍能积极协助康熙处理政务军务，传达谕旨，督修道路，令康熙十分满意。

伊桑阿非常注重刑狱工作。因为人命至重，不可不察，“每待直勾本，上有所问，辄能举其词，同列服气精详”。

1699年，伊桑阿参加朝审，复核死刑罪犯83人后，向康熙提出其中有疑点的事项。经康熙仔细盘查，终于使83人中有30人免于死刑。这期间，如果没有伊桑阿耐心细致的工作精神，一抓到底的坚持精神，是不会严谨对待这些案子以及其中所涉及人事的。

伊桑阿多次上疏请求退休，没有被批准，直到康熙四十一年，康熙才答允其以原官致仕，第二年去世。去世后，康熙非常悲痛，给了伊桑阿很高的评价：“伊桑阿历练老成，效力年久，简任机务，镇静和平，实心任职。自请告以来，尚期优游颐养，长享升平，用副眷注，忽闻溘逝，朕心深为軫悼。”

陶元淳

在康熙时期还有一个叫陶元淳的知县，也是工作始终如一的典型。在广东昌化任职期间，他兢兢业业，对所出现问题秉持扭住不放、一抓到底的精神，干出了政绩，赢得了当地百姓的爱戴。虽然昌化位置偏僻，条件艰苦，问题繁杂，但是陶元淳能够在上任后通过细致入微地调查研究，不辞辛苦地了解民情，“时步行村落间，问民疾苦，煦如家人”，这为其制定正确决策做了准备。

在与当地人接触中，陶元淳发现昌化县原来额定上交租税之田有400余顷，因频遭水患，“半沦于海”。原额中已有1/3成为不可能完成、无法落实的“浮粮”，官府催之甚急，百姓为之所困。爱民心切的陶元淳就此奏报上官，请求免去该地“浮粮”，上官置之不理。没有灰心的陶元淳，此时体现出一抓到底的精神气概，经过认真思考，撰写《浮粮考》一文，详细介绍该县“浮粮”产生的来龙去脉，奏报上官后，石沉大海，久久没有收到回复。

如果陶元淳此时遇到这样的挫折，选择逃避或者给人以垂头丧气之感，可能就没有他后来的政绩和美誉。他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，最大限度地为百姓谋利益。既然朝廷的税额不能免除，只能

在其他方面想办法，以减轻百姓的负担。他认为，“所以苏民困者”，只有“革正供外杂项”，“罢徭役，革杂征，自坊里供帐始”。陶元淳积极发展当地农业，劝课农桑，培植财源，增强当地财力。鉴于该县“海滨土瘠，禾稼鲜登”的状况，“乃度隙地立墟市，大招流亡，劝开垦，予以牛种”，且给予新开垦之地不征税的优惠政策，出现了“民始相率以力耕为业”的局面。

陶元淳治下的昌化县有少数民族黎人居住。以往官员为了方便管理黎人，选择当地“黎头”为“土舍”，协助官府征粮理讼。这个制度在当地贯彻过程中，产生了上下各取所需的弊端，“下之为土舍者，将凭官府之势以纵勒索之欲；而上之为官府者，又将役土舍之力以规物产之利也。上下交徇其欲”。了解到“土舍”一职设立后带来的巨大弊端，陶元淳决定“力行清理”，下令裁去土舍一职，并派人赴黎人居住的山寨张贴榜文，“有冤者得诣陈诉”。在陶元淳治理下，“一权量，定法度”，解决了“土舍”之患，使得“黎民乐业”。

在陶元淳的努力之下，昌化县的面貌焕然一新，发生了很大变化。原来的昌化县一派萧条景象，城外村烟稀少，城内居民“仅七十余家”。通过几年的治理和耕耘，“民始知有伏腊宴会之乐，于是闻风归附踵相错，城内外屋宇皆新”。昌化县面貌发生变化的同时，陶元淳因为劳累而身体日衰。他原先身体很好，“素强无疾”，担任昌化县知县后，对自身要求非常严格，“节衣缩食，署中尝至绝粮”。他忙于政务，没有充足的睡眠作保证，“坐是精力消之”。在他身体日益衰弱的情况下，遭遇昌化县旱灾降临。陶元淳积极组织抗旱，亲自登山祈雨，由于劳累和受寒，疾病逐渐加重，“竟以勤绩卒于官”，去世时年仅52岁。当他的灵柩运回家乡的途中经过琼州海峡渡口时，参加乡试的百名生员，得知是陶公的灵柩，争相护行。陶元淳的好友冯景评价陶元淳：“名传后世，岂必位高年长哉？”

“和平使者”王昭君

□ 赵 威

王昭君，约公元前52年出生于南部秭归（今湖北兴山县）。

公元前36年，王昭君被选为宫女，进入后宫。本来，就像千千万万的后宫女子一样，她会在高墙深院中过完平淡无奇的一生，湮没在历史的荒烟中。但命运有时也不按常理出牌。汉与匈奴的一次和亲，成就了“昭君出塞”的佳话，骚人墨客吟咏千年，将她咏进了中国文学的历史长卷，咏进了民族融合的恢宏叙事。

汉与匈奴和亲渊源

汉与匈奴的和亲，要追溯到西汉立国之初。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载：“匈奴，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。”说明匈奴本是华夏子孙，秦汉时，崛起于北方草原，各部落组成统一联盟，对中原政权形成较大威胁，秦派蒙恬筑长城以御北胡（即匈奴）。秦朝二世而亡，楚汉争霸，刘邦胜出。汉朝继承了秦的遗产，包括与匈奴的战争。

公元前200年，匈奴给了新立的汉朝一个下马威，把汉高祖刘邦围困在平城白登山（今大同马铺山）七昼夜。那时的匈奴，出了个有雄才大略的首领——冒顿单于，他趁汉朝未立稳之机，发兵越过长城，直扑马邑（今山西朔州）。驻守马邑的韩王信（战国韩襄王庶孙韩信，为避免与同名名将韩信混淆，史书多称其为“韩王信”），望风而降，太原告危，刘邦只好亲率32万大军迎战，两军在长城一线对峙。汉军取得几场胜利后，刘邦不顾前哨探军刘敬的劝阻，结果中了匈奴的诱兵之计，在白登陷入重围，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。后来，陈平献计，贿赂冒顿单于的妻子，才得以脱险。白登之围让刘邦认识到靠战争无法解决与匈奴的争端，于是采用了刘敬的和亲建议，开创了汉与匈奴的和亲史。“自从贵主和亲后，一半胡风似汉家”，和亲这一创举，可以看作对军事防御之不足的补救，但它的意义非同凡响，其历史影响尤为深远，不只是消弭

了战争，带来了和平，还让汉文化远播域外，也促进了民族融合。

然而，汉初的和亲，是在汉与匈奴的力量对比中，处于弱势地位而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策。汉朝以和亲的方式，每年为匈奴贵族进贡大量财富的基础上，维持和平局面，对于汉和匈奴的民族交流作用不是太大。昭君出塞时，汉与匈奴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逆转，与汉初的和亲有着本质的区别，它不是消极妥协的产物，而是民族团结和睦相处进一步加强的诗篇，是真正意义上的和亲。

昭君“光明汉宫，顾景裴回”

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，国力逐渐强大，到汉武帝时代，开始对匈奴主动出击。卫青、霍去病、李广等汉家大将屡屡重创匈奴，公元前71年，汉与乌孙联合，彻底打败匈奴，从此，匈奴无力与汉朝对抗。之后，匈奴出现内讧，五单于争位，力量消耗殆尽。其中，有雄才大略的呼韩邪单于打算向南归附汉朝，于是，上书称臣，愿意和亲。在这一背景下，王昭君出场了。公元前33年，呼韩邪单于第三次请求和亲，“愿婿汉氏以自亲”。鉴于其诚意，汉元帝答应了他的请求。

本来，王昭君“入宫数岁”，未得到汉元帝的宠幸。当汉元帝为呼韩邪单于从后宫甄选5位宫女时，王昭君自愿报名。在临行前的宴席上，汉元帝才第一次见到王昭君，当他询问5位宫女，“欲以一女赐单于，谁能行者？”远嫁大漠异族，人人视此为畏途，唯独王昭君自告奋勇，愿意前往。杜工部有诗：“群山万壑赴荆门，生长明妃尚有村。一去紫台连朔漠，独留青冢向黄昏。画图省识春风面，环珮空归夜月魂。千载琵琶作胡语，分明怨恨曲中论。”诗中“荆门”是王昭君的湖北老家；“明妃”是晋代人为避司马昭的讳，给她改的名字；“青冢”是王昭君之墓，此句独具匠心，写出了

昭君的人生悲剧；“画图”典出汉元帝的荒淫生活。当时，后宫佳丽太多，汉元帝只能让画师绘图挑选，以决定谁来侍寝，结果宫女争宠，向画师行贿，唯独昭君不吃这一套，与元帝不曾相见。等元帝见到昭君，已是佳人出塞时，追悔莫及，把画师弃市，以泄心头之愤。后世文人对这段故事添油加醋，成了昭君出塞的重要插曲。

就连《后汉书》这一“官宣”正史，都忍不住用细腻柔情的笔法，来记述昭君出塞前在临辞大会上的情景：“昭君丰容靓饰，光明汉宫，顾景裴回（徘徊），竦动左右。帝见大惊，意欲留之，而难于失信，遂与匈奴。”区区几十字，传颂2000年。

年号改“竟宁” 阼氏号“宁胡”

公元前33年，昭君出塞。这年本是汉元帝建昭六年，但是，为了纪念这一历史大事，汉元帝下诏改元“竟宁”。“竟”与“境”同，取“边境安宁”之意。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，向慕礼义，复修朝贺之礼，愿保塞，传之无穷，边境长无兵革之事，其改元为竟宁。”颜师古对此解释，呼韩邪得昭君，边境得以安宁，故称作“竟宁”。这在中国历史上，是唯一一次因和亲而改元的事件，可见汉元帝对这次和亲的重视，当然也含有对昭君的怀念与敬意，以及对和亲寄予的殷殷期望。

在另一边，呼韩邪单于从见到昭君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喜出望外了，当即就答应“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，传之无穷”，请解除戍守边境的士兵，予天子以安心，予人民以休息。王昭君远嫁胡地后，为呼韩邪单于生下一男孩，封为“右日逐王”，而王昭君则被封为“宁胡阼氏”。“阼氏”是匈奴语，意为单于妻子；“胡”在秦汉一般专指匈奴。宁胡阼氏，就是给匈奴人带来和平安宁的单于王后。

公元前31年，呼韩邪单于去世，前阼氏所生儿子即位。王昭君对故国家园仍旧不能忘怀，这时，她上书汉廷，请求回归，但是汉成帝敕令其遵从匈奴习俗，改嫁新单于，继续留在匈奴地。王昭君服从了这一命令，为新单于生下两个公主——须卜居次和当于居次。公元前20年，新单于去世后，王昭君自此寡居，一年后离开人世。

王昭君去世后，她在匈奴的两个女儿、外孙，以及内地的侄子王歙、王飒等，都继续为汉与匈奴的和平友好而努力。从昭君出塞到昭君去世，她与匈奴人民共同生活了13年，这13年时间为汉与匈奴此后60年的和平铸就了坚实基础。史载汉与匈奴“边城晏闭，牛马布野，三世无犬吠之警，黎庶无干戈之役”。王昭君把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以及文化成果带到了草原，如医术、纺织、种植术、养殖术、铸铁术、制陶、酿酒工艺等，提高了匈奴人民的生产能力，提升改善了生活水平。

王昭君化身和平使者，远嫁胡地，是一位弱女子的人生之不幸，却是民族之大幸。她不是简单地出嫁，而是为维持汉与匈奴的和平局面，身在异乡的她做了许多实事，换来了汉和匈奴人民几十年的安稳日子。在内蒙古多地出土的西汉鸳鸯砖、瓦当中，曾发现“单于和亲、千秋万岁、安乐未央”“单于和亲、长乐未央”等字样，而纵观西汉末年，和亲事件仅只昭君出塞一起，因此，这些字样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昭君出塞的颂扬。而王昭君墓的“青冢”出现在很多地方，也从侧面证明了历代人民对她的欣赏和颂赞。



在生活中，经常听说“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”的现象，而到处搬弄是非的小人却一时得志，以致使人对《易经》中所言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”的教诫产生怀疑，甚至为了眼前利益陷入尔虞我诈、钩心斗角的漩涡之中。

的确，即使历史上曾以撰写立命之学、改过之法、积善之方、谦德之效四篇家训而著称的袁了凡先生，也未免发出“善人常得谤，善事常易败”的感慨。那么“善人常得谤”的印象来自于哪里呢？

首先是“先入为主”的心理。

《格言别录》中讲，“德薄者，其心刻傲，见人皆可憎，故目中所鄙弃者众；德盛者，其心和平，见人皆可取，故口中所许可者多。”可见，善人待人厚道。而厚道的一个表现就是常见人优点，学人长处，并隐恶扬善，因此不愿在背后扬人之恶。而奸猾之人却恰恰相反，不仅扬人之恶，甚至为了达到一己之私无中生有，丑化甚至诽谤善人。他人听到奸人的不实之词，就会对善人产生一个“先入为主”的印象。这种“先入为主”的心理类似“亡斧疑邻”，一旦形成，再以此观察善人的一言一行，也无不与恶人的诽谤相符合。这种“先入为主”的心理也是人为什么应该特别注重留给他人的“第一印象”的原因。恶人到处造谣生事，诽谤善人，而善人总是与人为善，既不会诽谤他人，也不会防备他人诽谤自己，即使知道了恶人诽谤自己也不会为自己辩白，认为“谣言熏天，举火焚空，终将自息”。但是，那些不明就里的人们却认为这是善人默许了恶人的诽谤，便误以为恶人所言不虚。

“善人常得谤”的另外一个成因，是“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”的心理。

如果小人的境界平平，做事皆以名利为出发点和推动力，那么当他看君子做事的时候，也会以自己的境界推测君子。这也是为什么“自古圣贤皆寂寞”的原因。圣贤人也与普通人一样穿衣、吃饭、喝茶，但是其用心却与凡人不同。然而圣贤的用心在内在不在外，因而不易为人觉察。当小人观察到君子的行为时，往往以己之心度君子之腹，就会得出对善人君子的误解，甚至诽谤。

《弟子规》中说：“流俗众，仁者稀。”在社会中，就连仁者都稀有难逢，遇到圣贤更是如珍如瑞。因此，圣贤人难遇知音、寂寞寥然也在所难免，毕竟境界相近者才能惺惺相惜。就如至圣先师孔夫子，周游列国，无非是为了找到能够认识并推广其智慧学说的“明君”，解民众于倒悬，救国家于水火，拯天下于陷溺。此时，如果能够得遇圣君，其结果必然是“有不世之君，必能用不世之臣；用不世之臣，必能立不世之功”。这位“明君”也一定因重用孔子创下代辉煌盛世而载入史册，人类历史甚至也要因他而改写。然而可惜，当时的君主或者为眼前富国强兵的小利遮蔽了双眼，或者因不能放下自己的私欲而中途退缩，或者因孔子弟子多贤德，恐其后世会取而代之而放弃。再看现代，有多少学者把孔子解读为“官迷”，甚至将腐朽、落后、愚昧等词统统冠以形容孔子的思想言行，实在是诬枉圣人，看了令人捶胸顿足。

『善人常得谤』是真的吗

□ 刘余莉

当然，孔子虽不得志于当时，但是他的思想因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表彰六经”而被发扬光大，成为推动中国几千年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，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。孔子的后人也一直承传到今天，保持2000多年长盛不衰，代代仍有贤人出现。《中庸》曰：“夫大德者，必得其位，必得其名，必得其禄，必得其寿。”孔夫子所得的是素王之位，万世之名，百代之禄，无疆之寿。

历史不会重演，但历史的教训却可为后人汲取。世人唯有保持清醒的头脑、明智的判断、无私的境界，才能避免“善人常得谤，善事常易败”的悲剧，让善人在世时就能够充分发挥作用，成就善事。特别是对于领导者而言，知人善任、用贤不疑更是最重要的能力和素质。故老子曰：“自知者明，知人者智。”明智是领导者从优秀走向卓越的关键。

读史使人明智。看多了历史上诸多“委质策名，立功树惠，贞心直道，忘躯殉国，身殒百年之中，声驰千载之外；或大奸巨滑，转日回天，社鼠城狐，反白仰黑，忠良由其放逐，邦国因以危亡”的表演，对于善人恶人自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和清醒的辨别。

总之，虽然“先入为主”和“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”的心理使得“善人常得谤，善事常易败”在当时不可避免，也使人常常发出“自古圣贤皆寂寞”的感慨，但是历史却总是公平的。“德者，本也；财者，末也”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”“善不积不足以成名，恶不积不足以灭身”“多行不义必自毙”“患迪吉，从逆凶，惟影响”“德不孤，必有邻”等经典中的教诲，却是恒常不变的历史规律，至今仍发人深省，指引后人沿着进德修业的正确道路不断行进。

